上篇　中国大特区的崛起

1988 年，一向默默无闻、孤悬海外、贫穷落后的海南岛骤然被历史推上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一跃而成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的省级建制的特区。海南岛所发生的这种历史性变化，多少出乎人们的意料，但是，只要我们沿着 80 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轨迹，追寻海南岛社会历史发展的脚印，就不难发现这个历史现象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可以这样说，海南岛成为中国大特区，是 80 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和海南 100 多年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创办海南特区的战略决策

一、创办海南特区设想的酝酿

进入 80 年代,发端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及其他体制改革，从创办经济特区到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和地区，改革开放呈现出全面展开和不断加快的态势。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决策层一直在考虑如何加快我国第二大岛海南的开发建设问题，酝酿在海南创办大特区的设想。

(一)海南岛——改革开放之初中央特别关注的地区

1980 年，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乍涌。就在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给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创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以此启动中国对外开放进程不久，海南岛的开发建设问题便开始提上中央的议事日程。

海南岛和台湾岛同称是祖国的宝岛，两者面积相差无几，自然条件相仿，而在土地、矿产等资源方面，海南岛似乎占有优势。然而，当台湾已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时候，海南岛却是广东省最穷、在中国也属于经济落后的一个地区，仍然沉睡在封闭的半自然经济状态中。宝岛贫困这种异常现象，可以归咎为历史上的种种原因，但是，当中国决意融入时代的潮流，并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

设写在自己的纲领上后，就没有理由再让海南岛继续贫困下去了。而且，对于海南岛这样落后地区进行开发，还具有印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新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性的特殊意义。正是出于对宝岛贫困现象的反思和实施改革开放战略的考虑，海南岛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成为中央特别关注的地区，并很快采取重要的措施。6月30日至7月11日，根据国务院领导指示，在北京召开了海南岛问题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国务院11个部委的负责人和广东、海南的负责人。座谈会的主题是海南岛的经济建设。会议认为，鉴于海南岛特有的自然条件和突出的经济优势，应以加速发展橡胶等热带作物为重点，大力营造热带林木，努力提高粮食产量，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各业生产，逐步建立适应海南特点的新的生态平衡和农业结构，使国营农业企业和农村社队共同富裕起来。会议形成的《海南岛问题座谈会纪要》，国务院于7月24日以国发〔1980〕202号文件批转。《海南岛问题座谈会纪要》，反映了中央开发建设海南的决心，并提出对海南放宽政策，在进出口贸易等对外经济活动中，在财政体制方面，给海南更多一些自主权。海南岛问题座谈会和会议纪要，虽然在海南经济发展问题上仍然局限于热带作物和农业的思路上，但已初步表明中央对海南岛的工作指导思想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海南解放30年以来，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中央长期把海南岛主要作为国防前哨，把海南工作的重点放在国防建设上，因此国家没有投入必要的资金对海南进行应有的开发建设，尽管海南具有经济上得天独厚的优越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经济上却一直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尤其是工业方面，除了石碌铁矿，全岛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现代工业，连岛上居民必需的日用工业品基本上都要依赖大陆运进。如何改变海南岛的落后状态，把祖国的第二大岛开发建设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关注的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重要问题。为此，中央十分重视海南岛座谈会的召开，即将被任命为总理的赵紫阳和七位国务院副总理听取

了座谈会情况的汇报，之后又以国务院的文件形式批转了座谈会纪要，决定大力支持海南岛的经济建设。海南岛问题座谈会的召开和会议纪要确定的方针，反映出中央开始把海南岛的工作重点从国防建设为主转到开发建设为主上来。特别是纪要提出海南的对外经济活动可参照深圳、珠海市的办法，给以较大的权限，表明中央已在考虑开放海南岛的问题，虽然这一点后来在实际上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但却为日后开放海南岛做了必要的准备。

（二）中央决定在海南实行对外开放特殊政策

1982年党的十二大后，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我国的改革开放呈现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农村几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普遍建立，使我国农业生产打破了长期停滞不前的状态，获得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快速发展。城市改革开始起步，尤其是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使城市所有制结构发生重大变革，初步形成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广东、福建的对外开放初见成效，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蓬勃发展。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的建设全面展开，“四个窗口”的作用已露端倪。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功，促使中央决策层全面迈开改革开放的脚步，而海南在中国对外开放中所具有的重要战略地位进一步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

海南岛是我国第二大岛，地处北纬18°10′—20°10′，东经108°27′—110°03′之间，坐落在浩瀚的南海之中，北隔琼州海峡与雷州半岛相望，西濒北部湾与越南为邻，东面和南面是辽阔的南海海域，加上星罗棋布的南海诸岛，海南正好处在亚太经济圈的中心地带，是联结东北亚和东南亚的枢纽、往来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必经之地。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海南在发展亚太经济合作，沟通亚洲、欧洲、非洲和大洋洲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海南岛四周环海，港湾众多，有不少天然良港，具有发展外向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经济的优越海运条件。此外，海南还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具有巨大的经济开发潜力：一是热带生物资源。海南岛地处热带、亚热带之间，属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如春，气候温和，终年无霜，年平均温度 22℃—26℃，阳光、雨水充沛，是一个天然“大温室”，适应热带生物的生长和发展热带高效农业。海南岛有着中国面积最大的热带生物园，这里生长着经济价值很高的橡胶、椰子、腰果、胡椒、咖啡、南药等热带作物和稀世的热带雨林。二是矿产资源。目前已探明的有 50 多种，具有开采价值的有 30 多种，其中石碌铁矿是我国最大的富铁矿，矿石的平均品位很高，平均达 51%，高的达 67%；钛储量占我国的 70%，钴矿和锆英石的储量均占我国的 60%。尤其是海上油气资源，具有广阔的开采前景。三是海洋水产资源。海南岛及南海诸岛周围的广阔海域，水产资源十分丰富，有鱼、虾、贝藻类达 800 多种，其中经济价值较高的有 40 多种。四是旅游资源。海南是一块依然保持热带自然风貌的处女地，气候宜人，风光秀丽，空气新鲜，阳光明媚，具有当今世界旅游业寻求的“阳光、海水、沙滩、绿色、空气”五大要素，是世界上仅有的几块未受污染的净土之一。全岛可供开发利用的旅游点有 200 多处，特别是位于南端三亚市的亚龙湾，可与美国的夏威夷相媲美。五是土地资源。海南相对台湾而言，人少地多，平原地带占全岛土地面积的 60%以上，仍有大片土地是尚未开发的处女地。

海南在地理位置上的突出特点和丰富的自然资源，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展开而渐露峥嵘，从而使中央把推进中国对外开放的目光投向这个具有对外开放巨大潜在优势却长期沉睡的宝岛。

党的十二大后不久，中央即把开放海南岛的问题提到议事的日程上来，着手进行调查研究和准备工作。同年 10 月 12 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关于加快开发建设海南岛问题的批语中，建议由国务委员谷牧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门研究开放海南岛的问题。 11 月初，中顾委副主任王震到广州组织座谈，同广东省和海南行政区

的领导探讨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的路数，形成一个初步的思路。12月12日晚，谷牧和王震在北京召开一个小型座谈会，讨论如何落实中央关于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的精神。这个座谈会认为，海南岛加速开发建设的根本问题，是给政策、给自主权，要比广东、福建两省宽，比特区严些。座谈会后，国务院责成国务院办公厅特区组同广东省委就此进行调查研究。1983年伊始，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相继到海南视察，专门召开座谈会，听取海南方面的工作汇报和意见、要求，研究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和对外开放的方针和具体的政策和措施。与此同时，由8个部委组成的国务院工作组也在海南岛进行了半个月的调查研究。经过一系列思想准备、工作准备和组织准备，国务委员谷牧按照中央的精神，于2月9日、3月5日和12日，在北京先后三次召集国务院有关部门领导讨论研究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的问题。经过充分讨论，国务院各部委、广东省和海南行政区对中央决定开放海南岛的方针、政策达成共识，形成了《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文件。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中央11号文件批转了《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在11号文件中指出：海南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开发建设好这个资源丰富的宝岛，对加强民族团结，实现国家四化，巩固南海国防都有重要的意义。中央决定加快海南的开发建设，在政策上放宽，给予较多的自主权。中央11号文件批转的《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是中央开放海南岛的重大决策，也是80年代初期中央继开放广东、福建两省和创办深圳等四个特区之后，推进中国对外开放所采取的又一重要措施。

《纪要》按照中央精神，提出海南要实行“以对外开放促进内部开发”的方针，这一方针的提出，不仅从根本上转变了把海南主要作为国防前哨而采取封闭式建设的指导思想，而且明确海南在处理对外开放和内部经济建设关系上，要把对外开放作为开发建设

的火车头。为了落实这一方针，《纪要》提出了许多开放海南的具体政策和措施，主要有：

1.海南的某些重要的矿产资源，报经国家批准，可以由海南行政区同外商合作开发。

2.利用外资的新项目，固定资产总投资在 5000 万美元以下不需要全国、全省平衡生产建设条件，不涉及国家出口配额的，授权海南行政区审批。

3.海南岛内的“三资”企业所得税，从获利年度起第一、二年免征，第三年起按 15% 的税率征收。

4.利用外资项目需要进口的建筑器材、机械设备、生产原料和种子、种畜免征进口关税。

5.海南行政区产品超基数部分，凡不涉及国家配额的，海南行政区可以自行组织出口。

6.海南行政区可以根据需要，批准进口工农业生产资料，用于生产建设；可以使用地方留成外汇，进口若干海南市场短缺的消费品（包括国家控制进口的 17 种商品）。以上进口物资和商品的关税以及工商统一税，生产资料五年内免征；供应旅游、侨汇的商品按海关总署规定对待；消费品除国家控制进口的 17 种商品和烟酒外，其他试行减半征收。

7.海南行政区可以采取各种有利方式，同外商合作发展海南的旅游事业。同外商合资、合作经营的旅游项目，进口建设器材和营业用的设备、物品，免征关税。

8.外商到海南进行贸易活动和旅游，由海南行政区审查批准进入海南对外国人开放的地区和其他指定的地区，通知我签证机关核发签证。

中央 11 号文件给予海南岛的上述政策，与当时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实行的开放政策十分接近，甚至在某些方面比特区还要特殊。中央开放海南岛的重要举措，使海南发生一次历史性的跨越，

即从一个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海岛一跃成为当时中国开放度仅次于经济特区的开放区域，实际上成为“准经济特区”。从中央开放海南岛的时机选择，以及在讨论开放海南加快海南开发建设问题过程中的指导思想和主要思路来看，中央在 1983 年春天决定开放海南岛蕴含着深层的战略考虑：

第一，中央关于开放海南岛的决策，是在决定开放 14 个沿海港口城市和开辟三个沿海经济开放区，由点向面推进对外开放之前作出的，这一举动表明中央已将海南作为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第五个切入点，开始构建“四加一”对外开放前沿的格局。

第二，中央对海南岛的开放，是以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作为“参照系”进行设计的，无论是“以对外开放促进内部开发”方针，还是给予海南的特殊政策，其思路均仿照建设经济特区的做法。虽然当时的指导思想是比特区严些，但发展趋势是使海南岛往经济特区上靠。

第三，中央已在考虑把海南岛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政和经济单元单列出来，以利于中央给予必要的直接领导和财政上的支援，并有利于海南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经济体制方面，设想让海南有比较独立的经济体制；在财政和计划方面，海南不仅在广东省，而且也在中央单列户头；在行政方面，建议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海南行政区为一级政府，使其具有行政上较大的自主权,等等。

面对海南岛资源丰富、具有巨大的经济开发潜力却长期是中国落后地区之一的现实，具有高度历史责任感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展开的时候，即决心着手解决海南岛的问题。鉴于全国经济刚从十年“文革”的浩劫中复苏，中央财力有限，海南岛的开发建设不可能走主要依赖中央大量投入的路子。在经过深思熟虑的谋划后，做出了以对外开放促进海南岛内部开发的决策。由于海南岛的特殊情况，中央在决定

开放海南岛时，不仅给予海南很多除经济特区外全国其他地区没有的优惠政策，而且还给以某些连经济特区都没有的特殊政策，这种特殊作法，实际上埋下了中央进一步开放海南的伏笔，可以这样说，中央在 1987 年酝酿成熟的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设想，是在1983年春天播下种子的。

（三）总设计师开发海南的战略构想

又是一年的春天。1984 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为了总结对外开放的经验，筹划新的开放举措，80 岁高龄的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年初视察南方期间，于 1 月 24 日到 2 月 17 日，皆同杨尚昆、王震等，特地到他倡导和大力支持的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考察。这是特区创办以来，邓小平第一次踏上这几块作为中国对外开放前沿的热土。邓小平考察特区的目的，就是要亲自“看一看”特区建设情况，了解第一手材料，以特区的事实驱除人们对开放存在的种种疑虑，推进对外开放全面展开。在三个经济特区，邓小平听取了当地有关领导的汇报，翻阅一些材料，视察建设工地、工厂，直至深入渔村了解情况，特区超常的发展速度和兴旺发达景象，使邓小平兴奋不已。虽然在考察特区期间邓小平讲话不多，但面对特区取得的巨大成就，邓小平塑造开放中国的决心更加坚定，对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对外开放也已胸有成竹，一个全面展开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方案在总设计师的脑海里构思。 2 月 24 日，结束考察后返回北京不久的邓小平，以“只争朝夕”的历史紧迫感，邀请胡耀邦、赵紫阳、万里、杨尚昆、姚依林、胡启立和宋平等中央领导座谈，筹划和设计全面推进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大部署。在这次座谈会上，邓小平对开放问题讲得很多，讲得很深。他在充分肯定建立经济特区政策的正确性和深圳等四个特区取得的成就之后，斩钉截铁地指出：“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接着清晰地勾画中国下一步推进对外开放的设计蓝图：厦门特区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

搞成特区，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除现在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就是在这次座谈会的谈话中，邓小平提出了开发海南的重要战略构想，其主要内容有：第一，邓小平特别强调：“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胜利”。①这表明，开发海南岛已在邓小平设计的开放战略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从邓小平谈话的历史背景来看，这里所讲的“很大胜利”，其中就包括通过海南岛的开发和经济迅速发展，来展示对外开放政策和建立经济特区政策的“很大胜利”，显然，邓小平已萌发了把建立经济特区的试验扩展到当时经济还很落后的海南岛的设想。第二，提出用20年时间把海南岛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的设想。邓小平把海南岛的经济发展同作为省级单元的台湾岛相比，虽然具有政治方面的涵义，但也包含着在海南设省的深层考虑。由此可见，邓小平2月24日提出的开发海南战略的构想，是他日后办海南经济大特区思想的萌芽。如果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设想的种子是在1983年春中央决定开放海南岛时播下的，那么1984年春在总设计师的浇灌下已经破土而出。

（四）‘汽车事件’后中央对海南开放的筹划

中央1983年开放海南的决策和邓小平1984年2月24日关于开发海南岛的重要谈话，给海南带来了一派盎然生机和活力。富有开拓进取精神的雷宇等海南行政区主要领导抓住这一机遇，带领海南广大干部和群众，解放思想，利用中央给予海南的对外开放优惠政策，积极开展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大规模展开海南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开发建设，开创了海南开发建设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但是，由于缺少经验，特别是在工作指导思想上的急于求成和实际工作中采取急功近利的做法，雷宇等人在贯彻中央11号文件和邓小

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平谈话精神过程中发生了重大的失误，出现了震动全国的“汽车事件”。1984 年初，海南行政公署主任雷宇（海南行政公署改为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后任主要负责人）利用中央给予海南的优惠政策，批准进口 1.6 万辆日本丰田公司产的面包车。这批进口汽车表面上是批给各单位作交通工具使用，但买车单位则发现，把车倒卖出岛可以牟取暴利。于是，党、政、军各单位，工厂、商店、旅馆、国营农场、学校，甚至幼儿园都加入购车行列，纷纷向上级递交购车申请，而行政区的几位主要领导干部也开始批准额外进口汽车，刮起了一股大量进口汽车然后倒卖出岛的狂风。当广东省领导发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时，事态的发展已经失控，即使雷宇为了执行省领导的命令，亲自到码头去制止把汽车运往大陆，也无法阻止倒卖汽车的行为，以至在省领导下达禁止进口汽车的命令后，海南又批准进口汽车近 9000 辆，这样，从 1984 年 1 月到 1985 年 3 月的一年多中，海南共进口汽车 89000 多辆，远远超过海南岛自身使用的能力。进口汽车所需的外币和资金，主要是通过炒买炒卖外币和银行借贷款获得的。倒卖汽车所赚的钱，有相当部分确实用于解决海南资金困难，投入刚刚开始的基础设施建设，海南在这一期间出现的蓬勃发展，与此有密切的关系。但是，进口和倒卖如此多的汽车，花掉了国家辛苦积累起来的 10 亿美元，冲击了国家计划和我国尚处幼稚状态的汽车工业，违犯了国家外汇管理规定，破坏了国家信贷政策，从全局上讲，严重地干扰了全国的经济秩序，损害了国家的利益，也破坏了海南刚刚起步的对外开放进程。“汽车事件”出现后，中央进行了谨慎而又严肃的处理，雷宇被撤销广东省委委员、海南区党委副书记、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的职务，并调离海南岛到广东省内地的一个县任副书记。与此同时，中央实际上暂时中止了给予海南的一些特殊政策。当深得人心的雷宇悄然离开海南岛后，海南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心上蒙上了一层疑云：中央是否要改变开放海南的方针政策？从表面上看，中央在处理“汽车事

件”中采取的某些做法似乎是在“收”，但实质上，中央的意图是要整顿海南的开放秩序，规范海南的对外开放行为，使其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与此同时，也让海南广大干部和群众清醒一下头脑，反思过去，思考未来，以便按照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进一步推进海南的对外开放。后来的事态发展也充分表明，中央开放海南的决心不仅不因“汽车事件，，的出现而改变，相反，却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酝酿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设想。海南在两年多的对外开放过程中，虽然发生了“汽车事件”这样严重的失误，但开放使海南的潜在优势得到了一次显示和发挥的机会。中央在纠正海南出现的失误的同时，也从海南崭露头角的对外开放优势中增强了进一步开放海南的决心。

1986 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设想在中央悄悄地加速酝酿。2月 5 日，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等中央领导带领一些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再次到海南视察。这一次视察长达 9天，足迹遍及两市、八县达大半个海南岛，除了听取海南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外，还深入工厂、农场、机场、港口、自然保护区、旅游区、少数民族地区了解情况，同当地干部和群众商讨进一步开发海南的方针政策。显然这一视察是有备而来的，负有重要的使命。赵紫阳等中央领导在视察中明确指出：开放搞活的方针可以使海南独特的优越条件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开放、搞活方针要坚定不移地继续实行，不予改变。而且要进一步制定一些政策，敞开大门，放宽政策，给投资者以优惠待遇。[①]在视察中，赵紫阳等中央领导还同海南负责人商讨了在海南建省的可行性问题。当年的 8月，由国家计委赋予海南相当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赵紫阳一行结束对海南视察的半年多时间里，中央如何研究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问题，我们无法知道详情，但可以肯定，在处理“汽车事件”后的第二年，中央对海南建省

①《人民日报》1986 年 2 月 20 日。

办经济特区设想的酝酿已经明朗并趋于成熟。

二、中央对海南建省办特区可行性的调查研究

80 年代中后期，中国改革开放出现了新的高潮，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作为这一高潮的重头戏，被提到中央的议事日程上。从 1986 年起，有关海南建省办特区的一系列调查研究工作悄然而又加紧进行，海南建省办特区的重大决策，已是呼之欲出。

（一）中央加快改革开放：海南建省办特区的催化剂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从 1985 年起在全国如火如荼全面展开。按照《决定》确认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改革指导思想，改革向市场取向的方向展开和深化。早在 1979 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①] 邓小平这一思想，可谓一语惊四座，给刚刚起步的经济体制改革送来一种在社会主义发展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创新思想。《决定》就是根据邓小平的观点，作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论断的。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受到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这一传统观念的禁锢和影响，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在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在党内达成共识，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和深入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改革发展趋势。为了解决改革实践与认识中存在的摩擦和矛盾，推动经济体

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36 页，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10 月第 2 版。

制改革向纵深发展，一方面，党中央和邓小平进一步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新探索，另一方面，则考虑开辟一块新的“试验田”，超前进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综合改革试验，以便用实践成果证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佳目标选择。与此同时，面临国际上出现的大好机遇和我国对外开放的好势头，党中央和邓小平设想在初步形成的对外开放格局基础上，选择一个既具有对外开放区位优势，又能对全国产生普遍效应的地区进行层次更高的对外开放试验，实践邓小平已在酝酿的“再造香港”的新构想。由于改革与开放的紧密关联性，因此上述两方面的“试验田”理应集中选择一个具备这两方面试验有利条件的地区，而海南岛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经济社会结构成为这一选择的首选对象，主要有：

第一，海南不仅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而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二者的结合使海南岛在实行对外开放中具有比其他地区，包括已建立的四个经济特区更大的综合潜力，除了前面所作的分析外，还有重要的一点是海南四周环海，便于封闭，能够实行更加特殊的开放政策，即使出现一些问题也容易治理，这对于进行高层次的对外开放试验来说无疑是理想的场所。

第二，海南岛当时虽然只是隶属于广东省的一个行政区，但它拥有与台湾省差不多的面积，而且由于南海的分隔，使海南岛形成具有设省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在 3.4 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海南岛存在多元化、多层次的社会经济结构：既有相对发展的城市，又有贫困的农村；既有一定规模的现代工业，又有在海南经济中占优势而生产力尚落后的农业；既有相对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又有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既有汉族地区，又有黎苗族少数民族地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海南是中国社会和经济的一个缩影。在这样的区域进行改革开放试验，肯定会冲破城市型经济特区的局限性，更具有说服力，对全国各地区的改革开放更具有普遍的“排

头兵 ”作用。

第三，海南岛当时是全国经济落后的地区之一，这种状态固然会对改革开放试验带来一些不利的因素，但坏事可以变成好事，经济落后的状态，却为改革开放试验提供许多有利的条件：其一，经济的落后，使海南岛的经济总量在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分量微乎其微，即使海南进行的改革开放试验失败，也不会对全国经济全局造成多大的冲击和影响，从而能够把改革开放试验的风险系数降低到最低限度。其二，经济的落后，使海南岛的丰富资源和产业大多处在待开发的状态，而这意味着海南岛存在着巨大的投资和商业机会，对外商投资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这是进行更加开放试验的十分有利的经济条件。其三，海南的国有经济力量弱小，这不仅使海南改革计划经济旧体制的难度小于内地各省，而且从一开始就能为实行特殊经济政策，实行发展“ 三资 ”企业为主的方针创造一个宽松的经济环境。其四，由于经济的落后和国有经济力量的弱小，在海南岛，计划经济的影响和惯性作用比内地各省要小得多，因此一旦进行跨越性的改革开放试验，人们相对容易转变思想，适应新的变化，承受得起改革开放试验可能会带来的种种风险，譬如物价上涨等等，从而保证改革开放试验得以在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中顺利进行。

总之，在中央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催化下，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设想已是躁动于母腹中快要成熟的婴儿，眼看就要哇哇诞生了。

(二)可行性的调查研究

在改革开放的高潮中，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被提到中央的议事日程上来。从 1986 年起，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不再停留在设想的酝酿上，而是作为中央即要采取的重大措施，进入了对其可行性进行调查研究和论证的阶段。 1986 年这一年，中央各方面的领导人频繁到海南视察，尤其是前面提到的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一

行 2月所进行的 9天考察，使中央领导层耳闻目睹海南岛优越自然条件与落后现状的强烈反差，以及海南广大干部、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海南落后面貌的心情和愿望。这次考察，无疑对中央的决策起到重要的作用。除了中央领导亲临海南进行考察外，中央还在 1986 年 11月至 1987 年 4 月几次委派各方面要员到海南考察，目的是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对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可行性进行多视角的论证，以便为中央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这项工作是悄然进行的，但工作的节奏是急促的，尤其耐人寻味的是中央对所派人员的精心挑选：一位是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第一任市委书记兼市长，一位是在中国最早的开放城市广州任过市委书记的官员，一位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这三个人分别工作过或工作在三种层次的开放城市，由他们根据自己的见识和经验去审视海南岛加快开发建设的途径，为中央的决策提供有创造性的见解，不能不说是中央独具匠心的安排。

第一位受托到海南考察的是梁湘。这是一位 80 年代初期备受全国瞩目的人物。

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特区创办初期，梁湘曾担任了五年之久的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为深圳特区的创办和中国的改革开放立下了汗马功劳。退居二线后，担任广东省顾委副主任。1986 年 10 月初，中顾委副主任、后出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在海南岛视察期间，指名要梁湘到海南看看，实质上他的用心，是要梁湘为海南的开发建设出谋划策。 11 月，67岁的梁湘身负重托悄悄地飞抵海南岛执行重要的历史使命。在海南岛调查期间，用梁湘自己的话来说，他“和海南的同志一道，爬山涉水，足迹几乎踏遍了海南三万四千平方公里的土地”。① 他细心地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实地考察海南岛的实际情况，并结合自己在深圳工作中积累的对外开

①《海南日报》1988 年 4 月 17 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